读史札记

清代内阁大学士兼任军机大臣考论

刘　洋

在清代中枢机构中，学界长期以来惯以二元对立视角审视内阁与军机处之间此消彼长的权力关系，这主要缘于军机处设立后大学士参预机务权力被剥夺的固有认知。近些年来，部分学者着眼于内阁与军机处之间的人事联系，将军机大臣这一重要兼职纳入到大学士日常职能讨论之中，为我们重新审视其在清代国家治理中的角色与作用提供了新视野。① 尽管如此，学界对于阁臣入值军机这一人事运作方式本身仍有待细致、深入的研究。本文遂以常年入值军机的阁臣人数与首席军机大臣选授两个重要维度为基础，对清代大学士兼任枢臣问题作专门探讨。

一、大学士常年入值军机人数与时间分布

（一）雍乾时期

雍正帝继位后，为加强皇权以及出于保密性考虑，始行挑选少数亲信重臣日侍内廷参赞机务。至雍正八年（1730）十二月，皇帝又以办理西北军务、随时商酌为由，适时将亲信大臣入值内廷定制化，设立了军机处这一机构。② 原在内廷侍值的大学士马尔赛、张廷玉、蒋廷锡等人自然成为首批军机大臣，即所谓“大学士之在内者始由内廷供奉，其后以与军机益有名然”。③ 雍正年间阁臣在军机处一直保持着较高的入值比例，如表 1 所示，各年均有两至三人同时入值。因此，时人并不将军机处视为一个新的机构，而将其看作内中堂的办公地点，所谓“军机房，即内中堂办事处也”。④

至乾隆朝，大学士与军机处之间依然保持着密切的人事联系，所谓“其大臣惟尚书、侍郎

[收稿时间] 2024-03-28
[作者简介] 刘洋（1984— ），男，辽宁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故宫博物院博士后，大连 116081，liuyang1984318@163.com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阁臣多元差使与清代国家治理研究”（19CZS027）阶段性成果。

① 高翔：《也论军机处、内阁和专制皇权——对传统说法之质疑，兼析奏折制之源起》，《清史研究》1996 年第 2 期；高翔：《略论清朝中央权力分配体制——对内阁、军机处和皇权关系的再认识》，《中国史研究》1997 年第 4 期；杜家骥：《杜家骥讲清代制度》，天津古籍出版社，2014 年；祁美琴：《从清代“内廷行走”看朝臣的“近侍化”倾向》，《清史研究》2016 年第 2 期；刘文鹏：《军机大臣议复机制与清朝国家政治体制重构》，《中国社会科学》2023 年第 5 期；白彬菊：《君主与大臣：清中期的军机处（1723—1820）》，董建中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 年。

② 赵志强：《军机处成立时间考订》，《历史档案》1990 年第 4 期。

③ 席吴鏊：《内阁志》，《续修四库全书》第 751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第 267 页。

④ 叶凤毛：《内阁小志》，《续修四库全书》第 751 册，第 279 页。

被宠眷尤异者始得入，然必重以宰辅”。[①] 如表 1 所示，乾隆二年至六十年（1737—1795）的 59 年间毫无例外，每年皆有阁臣入值军机。其中有 3 位大学士同时入值为 32 年，占比 54.2%；2 人入值年数为 22 年，占比 37.3%。二者合计占居九成以上。值得注意的是，乾隆十三年后大学士定制才设有四缺。[②] 同时，阁臣入值军机在十年以上者亦较为常见。特别是鄂尔泰、傅恒、阿桂三人担任首席军机大臣最久，尤为倚重。他如张廷玉、刘统勋、于敏中等汉大学士亦值枢廷较长，进而有着相当的政治影响力。

表 1　雍乾年间大学士入值军机处人数分布情况

年代	年数	入值 3 人年数		入值 2 人年数		入值 1 人年数		无人入值年数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雍正	6	3	50%	3	50%	0	0	0	0
乾隆	59	32	54.2%	22	37.3%	5	8.5%	0	0
总计	65	35	53.8%	25	38.5%	5	7.7%	0	0

注：本表起于军机处设立的雍正八年，其中乾隆元年清廷裁军机处，其职能由总理事务王大臣兼办。

资料来源：《清史稿》卷176《军机大臣年表一》，中华书局，1976年；钱实甫编：《清代职官年表》第1册，中华书局，1980年。

事实上，尽管乾隆年间军机处取得了明显的发展，从原本处理西北军务的临时机构逐渐过渡为国家行政中枢，但其正式地位却仍未获官方承认。不仅乾隆《大清会典》未设有专门卷目，而且这一时期军机处无论是封发的寄信上谕，还是呈递的奏折，通常也只冠以“大学士某某”字样，并不书写“军机大臣”名目。但与康雍年间相比，乾隆年间在会典中却正式删去了内阁“机务要地”[③] 的表述，而改成大学士“赞理机务”。[④] 显然，这与该时期阁臣入值军机保持着极高的比例相一致。也就是说，此时大学士仍定位为“理机务”的职能角色，只不过伴随军机处的设立，办公地点由外朝衙署转入到内廷值房。

（二）嘉道咸时期

至嘉道咸年间，阁臣常年入值军机的人数比例有着明显改变。如表 2 所示，在这一时期的 66 年中，其基本以 2 位阁臣同时入值军机为最多，已接近总年份的 60%，特别是嘉庆朝 25 年中有 19 年为 2 人入值。3 人同时入值大幅度减少，尤其是咸丰朝无 3 人年份。与此相对的是，一位大学士在值军机的情况明显增多，超过总年份的四分之一。

表 2　嘉道咸年间大学士入值军机处人数分布情况

年代	年数	入值 3 人年数		入值 2 人年数		入值 1 人年数		无人入值年数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嘉庆	25	4	16%	19	76%	2	8%	0	0
道光	30	7	23.3%	15	50%	8	26.7%	0	0
咸丰	11	0	0	4	36.4%	7	63.6%	0	0
总计	66	11	16.7%	38	57.5%	17	25.8%	0	0

资料来源：《清史稿》卷 176《军机大臣年表一》、卷 177《军机大臣年表二》；钱实甫编：《清代职官年表》第 1 册。

该局面的形成与嘉庆以来皇帝有意增强军机处的独立性密切相关，进而形成军机处主机务、

① 王昶：《军机处题名记》，《枢垣记略》卷 22，中华书局，1984 年，第 269 页。
②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乾隆朝上谕档》第 2 册，档案出版社，1991 年，第 267、268 页。
③ 康熙《大清会典》卷 2《内阁》。
④ 乾隆《大清会典》卷 2《内阁》。

内阁主庶务的二元并立、各司其职的格局。在这种设计理念下，军机大臣在人员上亦排除内阁的垄断，所以大学士常年入值人数减少则势所必然。

一方面，军机处不仅被正式载入会典，而且清廷首次明确将“赞上治机务”的职掌归由军机大臣所属，[①]而名为“掌议天下之政”的大学士只能“赞上理庶务”。[②]可见，大学士参赞机务，是履行其差使角色军机大臣的职能，而非本职自身。因而官场皆云大学士不兼军机大臣，不为真宰相。

在此基础上，嘉庆年间“军机大臣”开始作为一项固定差使续入官员日常列衔之中。嘉庆二年（1797）九月，军机首枢阿桂病故后，乾隆帝不愿和珅独自领衔廷寄，以致引起外省无端猜测，遂一律笼统改为“军机大臣字寄”，并垂为定制。[③]而在奏折官衔中书有“军机大臣”当不晚于嘉庆后期。如嘉庆二十一年大学士托津等遵旨会议具奏天津水师章程的折件，董诰、托津、章煦、卢荫溥四人皆在本衔后写有“军机大臣”字样。[④]嘉庆二十二年军机大臣与吏部会同议处大学士松筠谏阻东巡的奏折中，董诰、托津等人更是直接将军机大臣列于大学士本职之前。[⑤]

另一方面，皇帝亦屡发上谕强调内阁票拟题本的重要性，并将其明确作为不入军机之外中堂的日常职司，正所谓“其不在内廷行走之大学士，俱着常川到阁阅本，以重纶扉而符体制”。[⑥]为进一步落实责任，清廷又于嘉庆十三年制定了外中堂轮日赴阁阅本制度，所谓“因念大学士等理应日赞纶扉，庆桂、董诰、戴衢亨供职枢廷，势不能常川到阁。嗣后着禄康、费淳、长麟每日轮流一人到阁先看本章”。[⑦]

（三）同光宣时期

同光以来，大学士在军机处的主导性明显减弱。一方面，阁臣常年入值军机人数大为减少。如表 3 所示，3 人同时入值年份占比仅为 6%，2 人比例亦骤降至 36%，二者合计尚不足总年份的一半。与此同时，无阁臣入值军机的年份大量出现，占比已接近四分之一。特别是同治朝 13 年中有 9 年无大学士入值，比例高达近百分之七十，这是以往从未有过的情况。另一方面，以大学士兼任军机大臣的时间显著变短。除宝鋆、额勒和布两位满大学士入值军机在十年左右外，再无超过十年者，如同以往供职枢垣数十年的情况则绝无一例。

表 3　同治以降大学士入值军机处人数分布情况

年代	年数	入值 3 人年数		入值 2 人年数		入值 1 人年数		无人入值年数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同治	13	0	0	1	7.7%	3	23.1%	9	69.2%
光绪	34	1	2.9%	16	47.1%	14	41.2%	3	8.8%
宣统	3	2	66.7%	1	33.3%	0	0	0	0
总计	50	3	6%	18	36%	17	34%	12	24%

资料来源：《清史稿》卷 177《军机大臣年表二》；钱实甫编：《清代职官年表》第 1 册。

① 嘉庆《大清会典》卷 3《办理军机处》。

② 嘉庆《大清会典》卷 2《内阁》。

③ 陈康祺：《郎潜纪闻二笔》卷 3，中华书局，1984 年，第 376、377 页。

④《军机处档折件》，嘉庆二十一年十月二十七日大学士军机大臣托津等奏，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档案号：故机 049906/ 049553。

⑤《军机处档折件》，嘉庆二十二年六月初二日军机大臣大学士董诰等奏，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档案号：故机 052270/051898。

⑥《清仁宗实录》卷 99，嘉庆七年六月癸亥。

⑦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 13 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年，第 16 页。

分析起来，笔者认为主要有两方面原因。其一，这一时期清廷以阁臣兼任地方总督的情况明显增加。如表 4 所示，在同光两朝的 47 年间，有 1 位大学士兼任总督的年份为 24 年，占比 51.1%；2 位同时外任者为 14 年，占比 29.8%。二者合计占总年份的 80.9%。尤其是同治朝 13 年间，无一例外每年均有总督大学士。自同治六年（1867）曾国藩以阁臣留任两江总督始，至光绪二十一年（1895）李鸿章甲午战败卸任直隶总督止的近三十年间，汉大学士中必有一缺留任地方。而在清代大学士满汉各两员的固有额缺下，伴随一定数量阁臣在外兼任总督的常态化，留京入值枢垣的人数亦随之相应减少。尤其是光绪前十年，由于李鸿章、左宗棠二人长期同时外任，使得军机处中无一汉大学士。[①]

表 4　同光年间大学士兼任总督人数分布情况

年代	年数	2 人兼任年数		1 人兼任年数		无人兼任年数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同治	13	4	30.8%	9	69.2%	0	0
光绪	34	10	29.4%	15	44.1%	9	26.5%
总计	47	14	29.8%	24	51.1%	9	19.1%

资料来源：钱实甫编：《清代职官年表》第 1 册。

其二，与清末汉大学士贯以功勋卓著之疆臣升授且长期留任地方不同，满蒙阁臣任用则颇循资格，多科举出身。尽管其文化素养大幅度提高，但实际为政能力却普遍不足，难以在内忧外患的局面下胜任参赞机枢的重任。如英桂、载龄、恩承、福锟、裕德等皆以“旧德老成，雍容台鼎”；[②] 理学宗师倭仁“未达世变，于自强要政，鄙夷不屑言”；[③] 而文煜、全庆、敬信入阁时均年逾古稀、精力衰颓。与此同时，自辛酉政变以来，清廷一改亲王不得入值军机的成例，先后任用多位宗室首掌枢垣以加强中央政府之权威，所谓“同光以后，世称军机权重，然特领班王大臣主其事耳”。[④] 在这种情况下，为防止不必要的掣肘，清廷降低了地位尊崇的满蒙大学士入值军机的人次。尤其是恭亲王奕䜣政治影响力最强的同治前中期，以及甲午战败后复用其收拾残局的光绪二十一至二十三年间，更是出现了无一阁臣入值军机的情况。

纵观有清一代大学士常年入值军机的人数情况，其呈现出以下两方面突出特征。

一是从总体占比来看，阁臣与军机处一直保持着密切的人事联系。综合上述各时期统计，有 2–3 位大学士同时入值枢垣达 130 年，占军机处设立总时长的 71.8%。与此相应的是，无阁臣入值军机年份只有 12 年，仅为 6.6%。事实上，这应与顺康以来大学士位列中枢、职司赞襄密切相关。即使嘉庆年间军机处正式载入会典后，其仍然有着“掌议天下之政”[⑤] 的宰辅地位。

二是从演变趋势来看，阁臣入值军机有着渐进弱化的特征。从雍乾时期 2–3 位大学士入值军机年份占居 90% 以上，到嘉道咸时期的 75% 左右，再到同光以降的不足 50%，比例持续降低。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其一，嘉道以来军机处独立性日显，并与内阁正式形成了二元分工的治政格局，以致清廷降低了大学士入值军机的比例，以保持其在内外朝之间的数量平衡。其二，晚清时期汉大学士外任总督的常态化和满蒙阁臣群体为政能力的不足，亦使得常年

① 左宗棠于光绪七年、光绪十年曾两度回京入值军机，但皆在数月后又外任地方。
② 《清史稿》卷 440《英桂等传》，中华书局，1977 年，第 12414 页。
③ 《清史稿》卷 391《倭仁传》，第 11743 页。
④ 《清史稿》卷 438《阎敬铭等传》，第 12391 页。
⑤ 嘉庆《大清会典》卷 2《内阁》。

入值军机的大学士人数显著减少。

二、首席军机大臣与大学士的人事联系

自雍正中期军机处成立以来，按例设有首席军机大臣一人，于诸臣中排名位居最前，并在中枢职能运作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然而军机首枢并非额缺职官，以至其选授在官方政书中均没有明确说明与规定。有鉴于此，笔者在对《清史稿·军机大臣年表》作以详细考订的基础上，梳理清楚有清一代首席军机大臣的任职情况，进而探求不同时期军机首枢与大学士之间的人事联系，以及中枢满汉权力格局的演变。

（一）雍正朝

这一时期共有三人出任过首席军机大臣，分别是马尔赛、丰盛额、鄂尔泰，均为满洲大臣。其中马尔赛、鄂尔泰二人为大学士，丰盛额为领侍卫内大臣。

《清史稿·军机大臣年表一》所载雍正九年马尔赛外任抚远大将军后，汉大臣张廷玉顺次递补首席军机。[①] 而事实上却是清廷坚持首崇满洲原则，暂以领侍卫内大臣丰盛额领袖枢垣。这在内廷奉旨发出的廷寄中可以得到明确印证，如雍正十年正月二十四日“领侍卫内大臣公丰等字寄宁远大将军岳”。[②] 然伴随鄂尔泰的内调进京，军机领班随即发生变更，如当月二十六日军机处发出的廷寄即是“大学士鄂等字寄宁远大将军岳”。[③] 值得注意的是，当鄂尔泰外出办差之时，内廷发往军前的廷寄则仍以丰盛额居首，而非汉大臣张廷玉。如雍正十年九月十八日，“领侍卫内大臣英诚公丰、大学士张、内大臣户部侍郎海、都统管理藩院事莽等字寄署宁远大将军查”。[④]

（二）乾隆朝

该时期曾有八人担任首席军机大臣，分别是鄂尔泰、讷亲、张廷玉、傅恒、尹继善、刘统勋、舒赫德、阿桂，皆为大学士。值得注意的是，与雍正年间清一色的满大臣相比，乾隆年间出现了张廷玉、刘统勋两位汉大臣短暂担任军机首枢的情况。

《清史稿·军机大臣年表一》所载乾隆年间军机首枢有两点不确之处。一是忽视了张廷玉曾于乾隆十三至十四年间短暂领袖军机的事实。乾隆十三年十月，领班大学士兼军机首枢讷亲获罪革职，皇帝则将未及而立之年的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傅恒升任为大学士。然鉴于朝局影响，故对内外班次排列重新做出了调整，以保持满汉政治相对平衡。

> 乾隆十三年十月初八日，内阁奉上谕：嗣后御门升殿一应外面行走列名傅恒在前，内廷军机处行走列名张廷玉在前。钦此。[⑤]

按此规定，内阁等外朝机构列名以傅恒班首，内廷军机处以张廷玉居前。也就是说，张廷玉终于在入值军机十余年后，成为了清代第一位汉人首席军机大臣。[⑥] 这在廷寄承旨人员名单中亦可得到明确印证，如乾隆十四年七月初一日，“大学士伯张、大学士公傅、大学士来字寄四川总督策、四川提督岳”。[⑦]

二是误认于敏中于乾隆三十九至四十四年间为首席军机大臣。[⑧] 事实上，当时前有舒赫德、

---

① 《清史稿》卷 176《军机大臣年表一》，第 6230 页。

②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谕旨汇编》第 2 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年，第 106 页。

③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谕旨汇编》第 2 册，第 107 页。

④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谕旨汇编》第 2 册，第 157 页。

⑤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乾隆朝上谕档》第 2 册，第 246 页。

⑥ 美国学者白彬菊亦忽略了张廷玉曾为军机首枢的事实，认为汉人担任领班军机始于乾隆中期的刘统勋，继之者为于敏中，参见白彬菊：《君主与大臣：清中期的军机处（1723—1820）》，第 212 页。

⑦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乾隆朝上谕档》第 2 册，第 323 页。

⑧ 《清史稿》卷 176《军机大臣年表一》，第 6254-6257 页。

后有阿桂，于敏中始终未能担任军机领班。乾隆三十八年八月，舒赫德始任内阁大学士，行走班次直接在刘统勋之前，居领班地位。[①] 在此基础上，军机处排名亦变更为以舒赫德为首，刘统勋则降居其次。如当年九月十四日，廷寄署名即为“大学士舒、刘、于字寄大学士仍管两江总督高”。[②] 乾隆四十二年四月，大学士兼首席军机大臣舒赫德病逝，皇帝遂以阿桂为内阁领班，所谓“阿桂系满洲大学士，其行走班次自应居首”,[③] 进而又以其居于首席军机地位。如乾隆四十二年七月十六日发出的廷寄即为“大学士公阿、大学士于字寄大学士管云贵总督李、云南巡抚裴”。[④] 阿桂领袖枢垣二十年，直至嘉庆二年八月，以八十高龄卒于任。

（三）嘉庆朝

这一时期共有六人曾担任首席军机大臣，分别是阿桂、和珅、永瑆、庆桂、董诰、托津。除永瑆以亲王之尊担任军机首枢外，其余五人本职均为大学士，其中董诰系唯一的汉大臣。

《清史稿·军机大臣年表一》所载董诰担任军机首枢时间至嘉庆二十三年二月致仕。[⑤] 笔者则认为嘉庆二十二年六月托津晋升领班大学士之时，已将其取代。嘉庆二十二年六月，松筠因谏阻皇帝东巡获罪革职，清廷以内阁系满大臣领班为名，命托津行走班次居于董诰之前。[⑥] 同日，军机处发出公启的结尾落款遂变更为以托津居中为尊，所谓“卢托董”[⑦] 公具，进而明确了其首席军机地位。

（四）道光朝

该时期有四人担任过首席军机大臣，分别是曹振镛、文孚、潘世恩、穆彰阿。其本职均为大学士且满汉人数对等，但任职首枢时长方面汉臣则占据优势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道光三四年间，蒙古大学士长龄曾奉命入值军机。《清史稿·军机大臣年表二》则将道光四年（1824）的军机大臣排名变更为以长龄居首，进而彰显旗人之特殊地位。[⑧] 但检之史料，情况并非如此。如道光四年正月二十三日，军机大臣、大学士会同户部堂官的议复奏折中，仍以汉大学士曹振镛为首，所谓“臣曹振镛等谨奏为遵旨会议具奏事”。在结尾落款处，曹振镛更是直接位居长龄之前。[⑨] 事实上，上述安排并非特例之举，正如前文所述大学士在军机处的排名一般遵照内阁班次。此年间因领班大学士托津未入军机，居于内阁次席的曹振镛自然居于军机首枢地位。[⑩]

此外，《清史稿·军机大臣年表二》又将穆彰阿始任首席军机大臣的时间误作为道光十七年。[⑪] 而此年汉大学士潘世恩依然领袖军机，如年末例行奏报当年领用纸张数目时亦沿用“潘世恩等跪奏”，结尾列衔更是居于首位。[⑫] 至道光十八年二月，满大臣穆彰阿荣升内阁领班，[⑬] 军机大臣排名才同步变更为以穆为首，潘则降为次席。如道光十八年闰四月二十四日，“臣穆彰阿等跪奏为会同审明具奏事”。[⑭]

---

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乾隆朝上谕档》第7册，第418页。
②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乾隆朝上谕档》第7册，第442页。
③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乾隆朝上谕档》第8册，第708页。
④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乾隆朝上谕档》第8册，第708页。
⑤《清史稿》卷176《军机大臣年表一》，第6275页。
⑥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22册，第179页。
⑦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22册，第180页。
⑧《清史稿》卷177《军机大臣年表二》，第6278页。
⑨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29册，第22、24页。
⑩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29册，第70、75页。
⑪《清史稿》卷177《军机大臣年表二》，第6283页。
⑫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42册，第494页。
⑬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嘉庆道光两朝上档》第43册，第35页。
⑭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43册，第178页。

（五）咸丰朝

此时期共有六人曾担任首席军机大臣，分别是祁寯藻、赛尚阿、奕䜣、文庆、彭蕴章、穆荫。上述人员中，除奕䜣凭亲王之尊、穆荫暂以兵部尚书担任军机首枢外，其余四人本职均为大学士，满蒙与汉维持均势各为两人。

《清史稿·军机大臣年表二》所载，咸丰元年（1851）祁寯藻为军机首枢，而二年时被蒙古大学士赛尚阿所取代。① 事实上，咸丰元年正月，赛尚阿就已晋升为文华殿大学士，班列众阁臣之首。军机处随即遵照内阁班次，同步改以赛尚阿位在祁寯藻之前，居于首席地位，所谓“大学士臣赛尚阿等跪奏”。② 然同年三四月间，赛尚阿以首席军机大臣身份奉命赴广西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军机处实际又改由祁寯藻主持。本年年末之时，祁寯藻更是直接列在外出经略军务的赛尚阿之前，名正言顺成为了首席军机大臣，③ 直至咸丰三年恭亲王奕䜣入值。

（六）同治、光绪、宣统三朝

同治以降，鉴于内忧外患的政治局势，清廷多任用亲王贵胄首掌军机以加强对朝局的控制，所谓“自垂帘以来，揆度时势，不能不用亲藩进参机务，此不得已之深衷”。④ 这一时期，共有四人担任军机首枢，除光绪二十七至二十九年间为满大学士荣禄外，其余时期则分别由恭亲王奕䜣、礼亲王世铎、庆亲王奕劻领袖枢府。

在此基础上，笔者特制成清代首席军机大臣人员情况表，共计 28 人，详见表 5。

表 5　清代首席军机大臣人员情况

序号	人员	民族	时间	序号	人员	民族	时间
1	马尔赛	满	雍正八年至九年	15	托津	满	嘉庆二十二年至二十五年
2	丰盛额	满	雍正九年至十年	16	曹振镛	汉	嘉庆二十五年至道光十五年
3	鄂尔泰	满	雍正十年至十三年、乾隆二年至十年	17	文孚	满	道光十五年
4	讷亲	满	乾隆十年至十三年	18	潘世恩	汉	道光十五年至十八年
5	张廷玉	汉	乾隆十三年至十四年	19	穆彰阿	满	道光十八年至三十年
6	傅恒	满	乾隆十四年至三十五年	20	祁寯藻	汉	道光三十年、 咸丰元年至三年
7	尹继善	满	乾隆三十五年至三十六年	21	赛尚阿	蒙	咸丰元年
8	刘统勋	汉	乾隆三十六年至三十八年	22	奕䜣	满	咸丰三年至五年、 咸丰十一年至光绪十年、 光绪二十年至二十四年
9	舒赫德	满	乾隆三十八年至四十二年	23	文庆	满	咸丰五年至六年
10	阿桂	满	乾隆四十二年至嘉庆二年	24	彭蕴章	汉	咸丰六年至十年
11	和珅	满	嘉庆二年至四年	25	穆荫	满	咸丰十年至十一年
12	永瑆	满	嘉庆四年	26	世铎	满	光绪十年至二十年、光绪二十四年至二十七年
13	庆桂	满	嘉庆四年至十七年	27	荣禄	满	光绪二十七年至二十九年
14	董诰	汉	嘉庆十七年至二十二年	28	奕劻	满	光绪二十九年至宣统三年

综合表 5 所示及之前的具体考述，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

① 《清史稿》卷 177《军机大臣年表二》，第 6290 页。
②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咸丰同治两朝上谕档》第 1 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年，第 3 页。
③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咸丰同治两朝上谕档》第 1 册，第 548 页。
④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 10 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年，第 73 页。

第一，从总体来源看，28 位首席军机大臣中由大学士兼任者为 22 人，占比 78.6%，处于绝对优势。这既源于大学士“勋高位极，乃以相授”① 的政治地位，又与阁臣本职即系赞襄政务密切相关。其又以两宫皇太后联合恭亲王奕䜣发动辛酉政变为界，前后迥然不同。从雍乾而至道咸，除少数特例外，军机首枢一直由大学士担任，显现出超强的稳定性。然同光以降，亲王首掌枢垣成为常态，阁臣兼任军机首枢则愈发稀见，仅有荣禄一人以满大学士身份短暂任职，汉大学士则绝无一例。这固然与晚清统治者通过宗室贵胄的显赫地位加强中央政府之权威以应对内忧外患相关，亦根植于作为少数民族政权的清王朝原有贵族政治的传统。

第二，从民族构成来看，22 位兼任首席军机大臣的大学士中涵盖了满、蒙、汉三个民族，呈现出多元民族分布特征。其中满洲大学士 14 人，占比超六成以上，突显了清朝中枢权力格局中一贯的“首崇满洲”原则。蒙古人仅为一位，即咸丰初年的赛尚阿，表明清廷虽以“满蒙一体”为既定国策，但其在朝廷中枢的影响力十分有限。此外，军机首枢中还有 7 位汉大学士，占比达到了 31.8%，彰显了清朝以满洲贵族为主体联合汉人士大夫的政权性质。值得注意的是，汉人军机首枢虽起自乾隆前期的张廷玉，但总体上仍以嘉庆、道光、咸丰三朝为主，特别是曹振镛以汉大臣身份领袖军机长达近十五年之久。这反映出清中期以来，伴随满洲人才的凋零，中枢权力格局已悄然发生变化。

第三，军机首枢选授遵从内阁班次原则，后者是确定前者的重要依据。一般来讲，在同治以前，宗室亲王未常态入值军机情况下，除乾隆前期为平衡政治关系，令傅恒与张廷玉二人分别领袖外朝与内廷之外，如内阁领班大学士入值军机则必为领袖。而当领班大学士未获入值时，军机首枢选授则多按照阁臣班次先后原则，而非“首崇满洲”的民族因素，进而为一些内阁班次居前的汉大学士担任首席军机大臣提供了可能。但值得注意的是，一旦内阁班次发生变化，军机处排名亦随之进行调整。如前所述，刘统勋、董诰、潘世恩任职首席军机大臣期间均出现了被后进的满大学士舒赫德、托津、穆彰阿取而代之的情况。

三、结语

有清一代，内阁大学士与军机处之间始终保持着密切的人事联系。总体而言，从常年入值人数来看，有 2–3 位大学士同时入值军机年份已占居 70% 以上；从首席军机大臣来源看，近乎 80% 的军机首枢均由阁臣兼任。这既源于大学士领袖班联的宰辅地位，又与阁臣本职即系赞襄政务密切相关。然嘉道以降，伴随军机处独立性日显，加之清末宗室亲王首掌枢垣，阁臣入值军机呈现出渐进弱化的趋势。

与内阁领班大学士例为满蒙不同，② 清代首席军机大臣则呈现出满、蒙、汉三族参用的多元民族特征。特别是清中期以降，伴随为政能力的下降，处于领班地位的满蒙大学士常不被选入军机，而在内阁居于次席的汉大学士则以军机首枢身份主持枢垣，体现了作为内廷机构的军机处灵活、实用的用人原则，正所谓：“首揆必兼军机，日蒙召对；次揆入见以时，恩礼有加。”③

---

① 《清史稿》卷 174《大学士年表一》，第 6089 页。

② 据笔者考察，除晚清特例以李鸿章系文华殿大学士衔居阁臣之首外，领班大学士皆为满蒙旗人充任。参见刘洋：《清朝大学士班次问题初探》，《历史档案》2011 年第 1 期。

③ 叶凤毛：《内阁小志》，《续修四库全书》第 751 册，第 273 页。